

在芝加哥参加美国经济年会杂记

许斌*

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2007年第1期 152-160页

美国经济年会 2007 年初在芝加哥举行。选择这个寒冷的淡季开会显示了经济学家的“本性”。因为在淡季旅馆的需求较低，而且是几千名与会成员“团购”，所以五星级的客房只收 89 美元，使“贫穷”的经济学家们能够支付三星级的价格来获得五星级的待遇。

参加年会是我和很多同行的习惯。虽然信息时代通过互联网交流很便利，但见面交流实在是不可替代的。这次我和中欧三位同事同行，而他们三人都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回娘家的感觉肯定更好。上海到芝加哥的直达班机使旅程轻松不少。往年大雪纷飞的芝加哥今年却不寒冷，莫非地球真的变暖了？

美国经济年会（AEA Meeting）是经济学家们对这次会议的叫法。确切地说，这次会议的名称是美国社会科学联合年会（ASSA Meetings），参加的协会包括美国经济协会（AEA），美国金融协会（AFA），计量经济学协会（ES），以及留美中国经济学家协会（CES）等约五十个协会。年会的主要活动是几百个同时举行的研讨会（Sessions）。每个协会组织若干个研讨会，每个研讨会的时间约两个小时，包括三至四个学术演讲。在三天的会议中每天早晨有两轮研讨会，下午有一轮研讨会。一般来讲每个演讲者用时 20 分钟，评论者用时 5 分钟，另外 5 分钟留给听众提问。会议的文章一般提前半年多就要提交。例如美国经济协会演讲申请的截至时间是前一年的 1 月底，而美国计量经济学协会演讲申请的截至时间是前一年的 3 月中旬。提交的文章被选中的概率依协会而异，但总的来讲有一定难度。虽然文章的提交在半年前，但演讲时的文章通常是最新的修改稿，因此所传递的是最新的研究成果。

今年我有幸有两篇论文获得演讲的机会。因为我的演讲都在第二天，所以第一天就去听了两场研讨会。我是做国际贸易研究的，最关心的自然是国际贸易问题的研讨会。第一天上午旁听的那场研讨会题为“国际贸易学的新方法”，是关于异质企业的国际贸易理论（Trade Theory of Heterogeneous Firms），演讲者包括哈佛大学的 Marc Melitz 等目前该领域最前沿的研究者。我旁听的另一场研讨会题为“成本发现经济学”（Economics of Cost Discovery），演讲者是哈佛大学的 Rodrik 和 Hausman 等该理论的推动者。Rodrik 认为一国经济的发展和出口结构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企业在尝试新的生产活动过程中对成本的发现。因为做生意成功与否是不确定的，需要有企业先去尝试，而成功所起到的示范效应会推动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提升从而经济的增长。Rodrik 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快速增长。他认为正是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推动了成本发现而使中国在提升产品结构的过程中得到增长的推动力，而证据之一就是中国能出口复杂度较高的商品如电子产品。评论 Rodrik 演讲的是宾州州立大学的 Tybout 教授。学术研讨会上评论者的工作主要是批评，尽管总是会客套两句，但评论多为尖锐的批评。Tybout

* 作者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

对“成本发现经济学”对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的解释提出了多方面的质疑。有意思的是，他在质疑 Rodrik 的文章时多次引用了我在会议第二天将演讲的关于中国出口商品复杂度的论文，因为巧合的是 Tybout 教授也将担任我的演讲的评论者，所以已经读过了我会演讲的文章。

年会在研讨时是严肃的，但在休会时很轻松。因为有共同兴趣的熟友新知聚在一起，相谈很热烈。我的不少学界朋友是在这种场合认识的。会议间隙的休会时间往往不够，交谈自然就移到了饭桌上。

第二天早晨我参加的是留美中国经济学家协会组织的一个研讨会，Rodrik 教授和我都参加这场研讨会。Rodrik 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念博士时的教授，当年我从他那里获益颇多，在论文写作中得到了他的具体指点，在找工作时又承蒙他大力推荐，所以我对他一直心存感激。我毕业后的那年 Rodrik 被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挖走，后来成为美国最有政策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论著《全球化是否走得太远了》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据说克林顿总统某次在飞机上读的就是他的这本书。Rodrik 这次演讲的是他 2006 年初写的文章，“中国的出口有什么特别之处？”在文中他发现中国出口商品的总体复杂程度远远高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对应的出口商品复杂程度，而和中等发达国家相类似。他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生产并出口相对复杂的产品很有关系，正是在生产这些产品的过程中中国的技术能力得到了提升。但 Rodrik 认为中国依赖提高出口产品复杂度这个经济增长源泉的空间越来越小，中国经济会因此慢下来。

我在 2006 年初阅读了 Rodrik 的这篇文章后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做了一些相关研究。我的一个发现是，Rodrik 的研究低估了与出口相关的中国的发展水平。中国出口的省份主要在沿海发达地区，它们的人均 GDP 是中国全国水平的人均 GDP 的 2 到 3 倍。另外中国出口的不少商品虽然属于高复杂度的产品类别（例如投影仪），但却是该类商品中的低端品种。经过这些方面的调整后我发现中国出口商品的总体复杂水平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利用中国企业数据，我和清华大学路江涌博士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中国出口商品复杂程度相对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华外商企业特别是独资企业的出口活动。

研讨会上我是 Rodrik 文章的评论者，而 Rodrik 教授是我的演讲的评论者。我一直喜欢 Rodrik 教授犀利的论文风格，所以在评论开始时开了个玩笑。我说 Rodrik 教授的文章不适合在睡觉前读，因为太刺激了，会让你睡不好觉。说了这句玩笑话后，我还是对他的文章作了较尖锐的评论。之后是我的演讲。Rodrik 教授在评论我的演讲前也开玩笑说这回轮到他了。他的评论很是到位，让我获得诸多启发。能够有这样的学术交锋真是研究者的快事。

下午在美国计量经济学会的研讨会上我演讲了和路江涌合作的关于外资企业和中国出口商品复杂度关系的论文。这次美国计量经济学会国际贸易方面的研讨会是由 Robert Feenstra 教授组织的。承蒙他的厚爱，选中我们的文章作为这个“外国直接投资的原因和影响”研讨会三篇论文之一。会上见到了多位学界好友，Bruce 主持了会议，Mary 演讲了一篇中国工资对外资作用的论文，Raymond 评论了一篇论文。Tybout 教授对我们的文章做了详细的评论。我和 Tybout 教授不熟，他在贸易政策实证方面造诣非常深。当我对他的评论表示感谢时，他很谦虚，说这次参加

会议较忙，没有来得及对我们的文章做更深入细致的评论，向我致歉。在美国经济学界象 Tybout 教授这样的纯粹学者让我特别尊重。

完成了演讲任务，终于可以轻松一下了。每次参加年会，有两个活动我不会错过。第一个活动是留美中国经济学家协会的晚间集会。在这里能够见到那么多老朋友，让人兴奋。会议的高潮是国内院校的推介，每个院校 5 分钟。记得两年前费城年会上我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做了推介，那时是免费的，而今年开始需要收费了。国内数十所院校的领导人踊跃登台，气氛热烈。其中既有常客（北大、清华、交大、上财等），也有新来者（人大，南开，西南财大，中央财大等）。印象最深的是西南财大副校长提到成都的“三美”和北大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芝加哥旧地重游的感慨。

第二个我必去之处是会议的书展。美国主要的经济书籍出版社都会参展，逛两个小时可以对近期热销和即将出版的经济书籍有个大致了解。这次我购买了两本书。一本是 Choi 和 Hartigan 主编的《国际贸易学手册》第二集，另一本是《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我还特别注意了 Worth 出版社的展台，看看 Feenstra 和 Taylor 新著的国际经济学本科教材何时出版。我受邀审阅了该书国际贸易理论的三章。该书预计在 2007 年底前出版。

这次参加年会有两点感触颇深。第一点是美国经济学研究传统的深厚。以前在美国工作时对此熟视无睹，但回国两年后再来美国，真切地感受到美国经济学处于世界前沿绝非偶然。我听到的所有学术报告水平有差异，但都是严谨的研究成果，随意性较小，不严谨之处立即会受到严厉的批评，与作者是否名家没有关系。美国经济学界人才辈出也让人感叹；在我熟悉的国际贸易研究领域新人的研究水平已经超越了前人。在和 Rodrik 教授和 Feenstra 教授闲聊时，我都猜错了他们最近去中国的次数。Rodrik 教授这两年才去过一次。为什么不多去几次？他的回答用了一个词，priority（优先次序）。显然他是含蓄地说尽管中国很有意思，但他的研究工作使他的 priority 不是去中国作报告。Feenstra 教授的回答让我更吃惊，他上一次去中国是四年前。但想一想也很自然。这几年 Feenstra 做了很多研究和推动研究的工作，那里分得出时间去中国？！但搞学问不就应该这样专注吗？

我的第二个感触是年轻的中国学者已经迅速成长了起来。在年会上有不少毕业于国内大学然后在北美获得博士学位进入学术界的七八十年代出生者。和这些“前辈”相比，我感到他们的学术能力不落下风，而演讲和交流能力更胜一筹。我不由得想起姚明，当初那个生涩的男孩今天已经可以在美国的电视上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了。正如毛主席说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我记得这也是林毅夫教授在那晚聚会时的感叹。

这次来芝加哥前，恰好收到《茶座》小洪兄约稿，被我因时间仓卒婉拒了。但机缘巧合，回程芝加哥飞上海的飞机由于通讯系统故障被迫推迟起飞近三个小时，给了我写下上面这些文字的时间。我记得普林斯顿的 Dixit 教授在《美国经济学家》上曾提到飞机延误的好处。某次因飞机延误 Dixit 教授利用那段时间在一篇论文上获得了重要的灵感。记得 Dixit 在文中开玩笑说，以后他想要灵感时就有意早去机场，但类似的灵感再也没有来过。我的候机时间肯定不会有 Dixit 教授那样的边际价值。写下上面这段文字，倒是可以向小洪兄交差了。